

一个“打工村”的生态群像



2月3日,正月初九,按照民间“三、六、九,往外走”的习俗,出门务工的农民赶往火车站。

大年三十女方来“看家”

16岁那年,孙亮从初二辍学,下南方去了。

“一看书就头疼”是他辍学的理由,这样的理由在乡下孩子中颇为常见。父母倒也不在乎这个。父亲考虑到大学生都很难找工作,即使让他勉强读下去,怕也没有啥好的收场。母亲则想得更远,“到南方尽量领个老婆回来呀。”

孙亮对母亲这种想法有些不屑,“人家的闺女又不是在野地里长大的,咱咋能说领就领?”他还是主张走明媒正娶的路子。不过,孙亮也不否认自己面对厂里女孩时的自卑和拘谨。

“不愿意跟她们多说话,有时候也不敢。”在孙亮的眼中,那些女孩们经常换手机、买新衣服,手里拎着大包的零食。

“太花钱了,咱养不起呀。”年前回到村里后,孙亮家里就动员亲戚邻居给他找媒。

在邓州的农村,男孩子想结婚,至少耍有一院气派的平房,若是不欠任何外债盖的,就更好了。

这样的平房,孙亮家有两座,加起来也有十来间。

到年底,外出务工人员返乡,他的婚事才有了眉目,对方是他小学四年级的一个同学,邻村的。大年三十,女孩在多名女性亲属陪伴下,到孙亮家来“看家”了。在豫西南,“看家”一般都是走走过场,在女方同意的前提下,陪同的亲戚提供点建设性意见。果然,“看家”顺利通过。不过,家长怕夜长梦多,商定过完年看个日子,尽快把婚事办了。

现在,连不识字的老村民都知道“金融危机”一词,孙亮和女孩都认为不能让婚姻耽搁求职的良机。

在两年前,随便哪个时节去南方,都有厂子可以进。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,一切都变了。

女孩跟孙亮约定,结婚后,要么她跟他南下广东,要么他跟她北上青岛,总之,不呆在村里。

打工者回家后的“闪婚”

孙亮的经历,按照在大城市里

的说法,就叫做“闪婚”——相亲快、定亲快、结婚快。不过,不到一个月就决定婚事,孙亮并不是“闪”得最快的。

同村比他大几岁的一个小伙子,在3年前,也是年底,从相亲到办婚宴,只用了3天时间。

外出打工的姑娘小伙,一年都只能在过年时回来一次,相亲,则是年龄越小越有优势。一旦过了25岁,姑娘难找像样的小伙,而一个超过30岁的光棍汉,想找好的老婆也不容易。

家长催婚的另一个动机,是怕男孩在外被远方的女孩把辛苦钱骗光了,或者,女孩跟外地的男孩走了,远天远地,家里岂不白养她一场?

尽管打工的生活很苦,但村民们的钱包越来越鼓,却也是实情。不少人一边叫穷,一边盖起成片的新房。在南河池村,发愁没有宅基地盖房的人,要超过发愁没有钱盖房的人。他们不介意为了一座平房或一场婚事,耗尽十几年的积蓄,大不了种地,饿不死的。

仅靠种地还不行

当然,在这个村子,土里刨食的农民,要想解决年轻人的终身大事和生计问题,仅靠土地还是不够的。

南河池村建立于何时,没有碑文和家谱可以考证。老人们说,他们的先人从明朝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搬迁而来。

这里的人世代务农,直到解放后,才慢慢有人走出去,成为“吃国家饭的人”。改革开放近30年来,这个600多人的村子,出了十来名大学生。

这些走出去的人,都没能给村子带来什么改变。近几年来,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,也使村民们放弃对读书的敬畏,不少孩子像孙亮一样,初中没毕业,就加入了打工的大军。

不能不打工。想娶媳妇就得有房子,钢筋水泥和建筑队工钱年年涨,一处7间房子的小院,至少要

10万块钱。

在南河池村,像孙亮这样的五口之家,大约可以分到13亩地。肥料在涨价,种子在涨价,柴油在涨价,而这里的主要经济作物辣椒的价格,却年年跌,从七八块钱一斤跌到去年年底的两块多一斤。

这13亩地辛苦一年下来,加上政府补贴,一亩地最多可以收6500元左右。单指望种这13亩地,何时才能凑够盖房子的钱,更何况还要吃饭糊口呢。每一个家庭和年轻人都在为生活打拼。

孙亮除了一个姐姐,还有个弟弟。弟弟跟他一起在惠州打工,每个月工资发放后,弟弟都必须把大部分钱交给哥哥,由哥哥寄回老家。

三个月前他们俩每个月分别都能拿到1600元左右的工资,再各寄回家里1000元。

“家里不花他一分钱,都攒着给他盖房子呢,他能有啥意见?”孙亮也不怎么花钱,最多去夜市里打打两块钱一场的台球。

厂里有工友喜欢吃喝玩乐,是“月光族”。孙亮不羡慕他们,他认为,人眼人是没办法比的。

在村里,孙亮两兄弟是众多打工者的好榜样。

并不是每一个打工者都那么顺利安稳。

同村的孙芳,在过去的两年里换了5个工厂,要么找不到工作,要么不适应工作。

“我脾气倔,主管等当官儿的喜欢骂人,别人忍忍算了,我不忍,跟他们对骂。”她当年离家时,是母亲给的路费。两年后返乡,身上不足一千块钱。

还有人喜欢花钱。孙辉前年在广州白云区一家鞋厂打工,月收入1800元。他喜欢喝酒,又喜欢跟工友打牌,还经常买六合彩。村民们发现,跟十几年前出去打工的人比,现在出去打工的小孩子,越来越容易沉迷于物质享受。

“空心”的村庄

语文12分,数学8分。这是

孙亮一个远房堂侄的成绩单,那是4年前,这个名叫孙晓的小家伙还在读小学。现在,孙晓在邻近的内乡县读初中,今年他宣布打死也不再上学。

“一看书就头疼”,他的理由跟孙亮当年辍学的原因如出一辙。6年前,他的父母赴杭州萧山区打工,将他和姐姐丢给了奶奶。

每次打电话,父亲孙大春总是教导两个孩子,“好好上学呀,以后别像我和你妈这样卖苦力。”但孩子显然没像他期望的那样。孙晓的姐姐在初中时变得越来越沉默,成绩也直线下降。孙晓则开始与一群逃学打架的小孩子混在一起,又常在小学门口的代销点赊欠零食。

孙晓的姐姐两年前就辍学了,现在一所技校学电脑。春节没过完,孙大春便赶到南阳,开始为儿子找技校了。

“我也知道大人常年不在家,肯定让孩子吃亏。”孙大春说,“不过,不出去咋办?这种地能挣个啥钱?”在邓州市,像孙晓这样的留守儿童还真不少。

村干部们越来越担心,这些被父母丢在老家的孩子,成绩普遍很差,十年八年后,当他们长大成人,除了出去继续卖苦力,还能干些什么?

而对于那些失业回来的打工者,村里也没有想出什么应对的方法,至少目前还没出现什么土地纠纷问题。

林林总总的开支

20年前,还没有普及拖拉机的时候,村里谁要能养一头大公牛,赶着大牛车,把庄稼活儿做好,便是村民们羡慕的对象。现在,这些人都老了,在寒冷的北风中,他们抄着手,旁观着年轻人的热闹。

家庭里的权威,也在向那些能挣钱年轻人转移。

孙亮的父亲以前喜欢赌个钱,别人劝阻多次都没用。但当孙亮在南方打工后,父亲开始听他的话

了,天天躲着那些赌友,这让孙亮的母亲颇感欣喜。在村人看来,在村里,要么你勤奋,要么你聪明,只有你能挣更多的钱,盖更好看的房子,才能获得别人的抬举。

只是,一些人情世故的开销,也让一些打工者感觉不安。

“我都不敢回来了。”孙大春腊月二十八从杭州回村,不到三天,买年货走亲戚,就花了2000多块钱。两个孩子上技校,还得花钱。此前连续三个春节,他都没有回村子过年。来回路费贵不说,人情往来太厉害了。村子里几个月薪超过3千元的年轻人,都是在青岛的电镀厂打工。天天接触重金属,他们明知道毒素会在体内沉积,不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在他们看来,即使挣来更多的钱,也是不太容易。

一条鼓励创业的短信

大年三十这天,孙亮接到一条当地移动公司的短信,说政府为本地务工人员,制定了种种优惠措施,“欢迎回故乡创业”。

短信没有究竟有哪些措施,孙亮也懒得问。

而根据媒体报道,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,邓州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5万以上。该市积极开辟创业、培训、基础设施建设三条“绿色通道”,力助返乡农民工再次就业,扶持携带一定资金返乡的农民工投身种植、养殖业,简化工商营业执照的办理手续,优先为他们办理每人不低于2万元的财政贴息贷款。

在孙亮看来,在村子里,大家都想创业发大财,却不知从何创起。

村里只有两家养鸡场,十里外的镇上,做小生意的都挤破了头,没有什么空间留给这些更偏远的农民。村里没有矿藏,附近也没有工厂,这里没有太多可以向外乡人炫耀的东西。

村里150多个出外打工的年轻人,靠着亲戚朋友的帮忙介绍,多是去广东的一些服装厂、玩具厂工作,也有人到青岛的电镀厂打工。金融危机使得在外地从事轻工业的打工者都发觉,钱越来越难挣了。他们有的想再出去碰碰运气,有的只想在老家避避风头。

从事重工业的也不例外。孙大春以前在的翻砂厂,在去年下半年,工作量就越来越少。“老板说是金融危机闹的,我不懂啥危机,钱挣得少,我就换厂子。”

年前,孙大春蹲在人群中,跟村南头几个年轻人聊挣钱的门路。“要是去年春上,我在那里的翻砂厂介绍进去十个八个没一点问题。今年,我不敢打这个保票。”孙大春深深吸了口烟。与城市人对失业的敏感不同,这些出去打工的农民工有着随遇而安的朴素想法。

孙亮离开南方时是失业的,再回去是否能找到工作?“应该可以吧,我弟弟还在那里呢。”但他也不敢过于乐观。

孙亮打算过了正月十五把婚事办了以后,将继续背上行囊,到沿海去碰碰运气。

他们美好的期望,就像门上新贴的对联,一年接一年。

(摘自《新京报》)